1101

杭州文史资料

第十八辑

政协杭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杭州文史资料

第十八辑

政协杭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1993年12月

杭州文史资料

（第十八辑）

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杭州云轩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　1/32　印张：6　字数：12万

1994年1月　第　一　版

1994年1月　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2,000

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　浙出书临（94）第002号

目　录

人物春秋

张衡先生任职杭州市参议会议长的前前后后
…… 张天立（1）
文坛高士　史界硕学
——记徐映璞先生…… 胡国枢　霞　影（12）
“兰社”诗人戴望舒…… 章达庵（27）
忆京剧前辈刘福芳老师…… 娄继心　周校卿（30）
记杭州籍书法家边成…… 钟水浩（34）
封建霸头杨松山的罪恶生涯…… 沈洪元（38）

文苑史迹

杭州铁路文化宫今昔…… 刘慕寒（45）
杭州解放前电影业的兴衰…… 周少敏（52）
杭城最早的新书店
——记商务印书馆杭州分馆…… 朱友伦（58）
忆杭州古旧书店…… 朱友伦（64）
杭州时调小曲…… 王与昌（70）
杭州丝竹…… 王与昌（78）
杭州南词的兴衰…… 杨子华（86）
民国时期的杭州评话《水浒》…… 杨子华（93）
音协杭州分会在五六十年代的活动…… 许为通（104）

往事追记

中兴光复会暨浙江分会…… 裘燕江（113）
我参加了杭州反美学生运动…… 金　明（133）
忆杭城“六·一三”反内战大游行…… 金　明（137）
一次用心险恶的“邀请”
——北京高师学生访日追记…… 邵延焘口述　毛飞明整理（141）
我在杭州市警察局第六分局任上…… 阮捷成（145）

历史陈迹

钱塘江“茭白船”和江干“花牌楼”
——抗战前杭州“南部花区”妓馆见闻… 陈瑞芝　何永德（152）
解放前拱宸桥娼妓业…… 何扬鸣　陈瑞芝　何永德（160）

《杭州文史资料》第12—18辑（1989—1993）
篇目分类索引…… 文史办公室（165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张衡先生任职杭州市参议会议长的前前后后

张天立

张衡（1889.7—1970.12），字佐时，杭州人。毕业于浙江师范和浙江法政学校，抗战前曾先后任浙江师范、第一师范、甲种商业学校教师，第一师范讲习所所长，浙江省公众运动场场长，通俗图书馆主任，江苏省教育厅秘书，南京中央大学教师并任秘书长（期间参加了国民党，时在1927年），浙江省政府第三科科长，律师等职。1924—1925年，张衡受浙江省政府委派，曾与张行简先生等去苏联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、奥地利、比利时等国，进行欧美教育与社会调查。

抗战期间，杭州沦陷。因不愿为日寇做事，拒任伪浙江保安处秘书主任、嘉兴清乡局秘书及浙江一中和一师校长，而逃难到上海，全家仅靠张衡先生“跑单帮”做生意谋生。

抗战胜利，杭州光复。张衡先生携全家于1945年8月由沪返杭，在自己住处横紫城巷29号（现31号），办起了“张衡大律师事务所”，姚先生及邵先生分别任帮办、书记。他任律师期间遵循三个原则，即：不办刑事原告案；在民事案中对经济困难者费用少收或不收；民事以和解为主。

由于张衡先生在杭州沦陷时不愿为日寇做事，且又在教育、法律界有一定声望，因而1946年4月，杭州市成立临时参议会时，被省民政厅厅长阮毅成指定为参议会议员。张衡先生因自己在日伪期间历史清白，此时又能任议员代表“民意”，感到高兴。当时他对国民党还是抱有幻想的。

临时参议会成立后，共开过两次会，会期一周。1946年9月，经普选正式成立了杭州市参议会，张衡作为拱墅区的代表名额被选为议员。杭州市政府秘书长罗云为议长，副议长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、杭州市党部书记长许熹担任。一个月后，罗云因包庇汉奸问题辞职。此时须改选议长，但许熹和朱一青（曾任杭州和立新群高中校长、国民党杭州市党部书记），均想乘机染指议长职位，两派势力旗鼓相当，互不相让。最后因为许、朱均系张衡先生之学生，张先生又与国民党中张强、罗霞天两派均无瓜葛，被视作“中间派”，有利于协调参议会的工作，因而被一致选为议长，许熹任副议长。根据许的提议，议长、副议长专管议事，凡参议员有提案由议长、副议长主管，凡秘书、人事、经费均由秘书主任徐福三负责处理。张衡当选议长之日，省民政厅厅长阮毅成说：“你们得到了一个德、智、体兼全的议长”。从而使议长之争得到了平息。

参议会成立后，议员每三个月开会一次，每次为六天。其待遇每个议员每天出席给10元车马费。由于当时物价飞涨，货币逐日贬值。有人提议，会议期间加付议长、副议长80元“办公费”，张衡坚辞不受，仍维持议长、副议长与所有议员一律同等待遇。

1946年初，国、共两党政治协商行将破裂之际，杭州市

参议会发出“代电”，向国、共双方呼吁“勿启内战，以安民生”。不久在国民党的破坏下，协商破裂，国民党最高当局下达了反动的“勘乱建国令”。浙江省参议会代电国民党中央表示拥护。其时正值市参议会开会之际，参议员庞菊甫（国民党杭州市执行委员）临时动议：依照省参议会也应代电表示拥护。参议员华赐（国民党杭州市执行委员）附议，动议案成立，逐交付大会讨论。与会者33人一致同意，由议长宣告通过动议案，向国民党中央代电拥护。张衡原以为参议会仅是民意机构，不应涉及党派政治，此事发生后他认识到，参议会是国民党的御用工具，内心始感苦闷。

参议会成立后不久，约于1946年底或1947年初，杭州市设立兵役协会，市参议会须推选代表一人参加，参议会推选张衡议长做代表，而兵役协会又推选张为主任委员，张推辞不了，勉强就任。当时国民党中央规定每名兵员的安家费2元，为数甚少，市兵役协会经研究决定改为100元，筹款与发放由各区负责，协会负责稽核并登板公告。后来国民党天津驻军某部来杭自行募兵600名，不久以后，国民党中央又规定在杭州征兵600名，为此张衡先生代表协会向国民党中央请求免去征兵额，以减轻杭州人民负担。当时国民党中央许之，但不久协会接到上面训令，谓：“以后中央对协会为减免问题向中央的请求概置不理。”张衡认为参议员如不能为民讲话即是失责，于是在参议会开会时提议撤回参议会在协会之代表（即张本人）。此案获通过后，张先生不再去兵役协会，协会主任后继无人，从此兵役协会再也未开过会，形同虚设。

1948年长春解放前几天，省参议会发出快邮代电长春守

军首领郑洞国，叫他死守长春。其时正值市参议会开会，副议长吴刚乾（市第二区区长）提议，市参议会应照省参议会也发一代电。于是议长张衡就嘱大会秘书，起草代电郑洞国死守长春。结果解放军进军神速、郑洞国尚未收到代电长春已被解放，郑本人也参加了起义。

1949年1月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后，张衡先生看到国民党之精锐部队已被消灭，政府越来越腐败，民心向着共产党，国民党的跨台已只是个时间问题，杭州不久即将解放。他考虑到：自己与国民党没有渊源关系，如跟随国民党一起逃跑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。因此须为自己及全家着想，及早考虑退路才是上策。于是决心留居杭城，为迎接杭州的解放做点好事。此后他的态度始有了转变，在他主持下的参议会也作了一些有益杭州人民的事。事实证明，他的这一历史的选择是正确的。

1948年7月，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登记，规定凡党员放弃登记以“脱党”论。张衡先生毅然放弃登记。杭州市党部两次来信劝其补行登记，但张先生均不理睬，从而主动从组织上脱离了国民党，成为在当时少见的不是国民党员的参议会议长。

1948年8月，由张衡议长提议杭州为“不设防城市”，并一致通过代电，向南京和延安呼吁“不在杭州市内作战，保全杭州城市建筑，保全钱江大桥。”

1948年8月，国民党市政府交参议会，议“杭州设置城防碉堡案”，由杭州市筹款建几十个碉堡，用以抵抗“共军”进攻。当时参议会由张衡任审查长兼大会主席。会上张衡指出此案若通过，杭州将会因战争而成为糜烂，因而倡议

否决，参议会一致同意否决。

在“杭州成为不设防城市案”和否决“设置城防碉堡案”通过后，当时国民党杭州警备司令部政工处长王浩说：“张衡的倡议是在和共产党吊膀子，可杀”。

1948年11月，杭州市成立“军民合作站”，负责在杭募款募米供应往来之国民党军队。当时规定由市参议会议长兼任军民合作站总站长，这时的张衡先生已再也不愿为国民党作工具，为“内战”服务，因而坚决不愿就任。国民党当局多方软硬兼施，张先生仍不予理睬。后国民党军部来一严厉训令说：“参议会议长须兼任‘军民合作站’总站长，系中央规定，全国统一施行，杭州不能独异”。在此情况下，张先生在参议会提出辞去议长之职。在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下，参议员朱一青提议：“张议长年老力衰，不能兼任军民合作站总站长，本会可推朱承德参议员代任，张议长不用辞职”。到会议员一致同意，由朱承德代任（朱当时任杭州市自卫队副总队长）。事情总算这样了结。

1948年7月，根据国民党中央规定，杭州市成立“勘乱建国委员会”，并规定由市长周象贤任主任委员，参议会议长任副主任委员。张衡先生极不愿意就任此职，参议会中不少议员也表示同意张议长的意见，因而当市政府多次来信通知开会时，张衡始终不参加会议。市政府提交市参议会议“勘乱会经费由营业税和房捐税项下加捐”一案，张先生认为此举将增加民众负担，提议否决。参议会中亦有不少人认为此案如获通过，必将增加人民负担，以后老百姓要骂，日子难过。于是经过讨论同意，予以否决。1948年10月由任显群继任市长，再次提交参议会议“勘建费”案，参议会再次否

决。1948年12月俞济民任市长，再次召集“勘建会”，张衡先生仍不出席，以致勘建会”的经费问题始终没有落实，“勘建会”本身也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。

1949年4月中旬，正值杭州解放前夕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通知市参议会，说为了时局问题在《东南日报》馆楼上召开“应变会议”，叫议长张衡出席。张衡按时到会，得知会议由警备司令部政工处王浩处长主持，张衡考虑到因自己倡议“杭州为不设防城市”及参议会对杭州“设置碉堡案”否决后，王浩曾认为“张衡与共产党吊膀子，可杀”，因而唯恐参加会议后，如强加给自己任务而无法脱身，因而不进入会场就回了家。“应变会”当时推出常务委员九人，并要求到会者均回本单位组织“应变会”，凡参加者发给14元“应变费”和1石至1石5斗“应变米”，通行证1张。张衡既未参加会议，也不在参议会组织“应变会”，当然也就没有领取这些“应变费”、“应变米”。

1949年4月下旬，解放军已接近杭州，国民党已组织党、政、军、警部门纷纷南逃，参议会中有些议员也偷偷逃离杭州。一天，参议会召集留下来的参议员举行会议，讨论时局问题。不少议员在会上表示担忧：在国民党败逃，解放军尚未进城之际，杭城会出现“真空”状态，社会上将出现混乱，对市民安全及城市秩序不利，也有的为其自身利益考虑，因而都认为应该有一个临时组织，担当维持“真空”时期地方治安的责任。在参议会席间休息时，议员们还对此议论纷纷，当时朱一青提出组织一个“应变会”。第二天会上大家继续讨论时局问题，朱又提出“应变会”一事，议长张衡认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曾提出组织“应变会”，而此机构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与临时过渡之目的不同，所以认为用此名称不妥，会上有人主张推举几个筹备员进行调查研究，并于次日邀请地方人士召开座谈会，征求各方意见。众以为然，当场推出筹备员九人：张衡、罗云、蔡竞平（杭州电厂经理）、高维魏（高义泰布店老板）、周师洛（民生制药厂经理）、徐文达（大东阳火腿公司老板）、程心锦（杭州市商会理事长）、刘清士（都锦生丝织厂湖滨门市部经理）、汪廷镜（艮山门邮局局长）。

第二天参加座谈的有余绍宋（著名书画家）、吕公望（省参议会副议长）、阮毅成（省民政厅厅长）、金润泉（杭州中国银行行长）、朱家明等连同参议员三十余人，公推余绍宋为临时主席。会议对建立一个临时机构负责维持"真空过渡"时期的社会治安问题表示同意，但名称叫什么未作决定。同日晚上张衡与吕公望、金润泉、斯烈、陈子明、王邈达、程心锦、罗云等十余人在商会研究，吕公望提出用"临时救济会"的名称，大家一致同意。吕说此事要征得省主席周嶽的同意才能开会。次日吕等先托市长俞济民探问周嶽之意，后来诸人又来到周嶽办公处，被告知："周主席对组织救济会取默然态度。"随后见周嶽亲自出来，张衡就对周说："我们参议会决议杭州为不设防城市，以保全地方，希望主席采纳民众之意见，对杭州尽力保护。我今代表民众向主席进言：看来解放军就要到杭，我们在军事上不是抵抗就是撤退，如须抵抗，请在距杭州几十里之外；如撤退请主席在军队撤退完毕以后，最后一个走，以维持地方秩序。"周回答说："如撤退，我决定最后一个走"。

4月24日晚，在商会成立了"临时救济会"，推选吕

公望为主任委员，张衡、程心锦为副主任委员，并规定省、市参议会议员均可自由参加。25日张衡到参议会叫秘书通知全体参议员：准确过渡“真空”，现已成立“临时救济会”，欢迎大家自由参加。当日下午“临救会”又推举出常务委员二十五人，由徐福三、任秀清任秘书。26日开始办公，由吕公望提议朱一青担任总干事。会议还确定“临救会”的四项主要任务：一、调拨杭州市“自卫队”数十人，常驻参议会中，遇有社会上抢劫等报警，随时出动弹压；二、组织工人纠察队、商民纠察队及在乡军官纠察队；三、救济流亡学生；四、派救火车数辆，满载自卫队通夜巡逻。此外还设“难民收容施粥所”。

“临时救济会”成立后，因缺乏经费，张衡与吕公望、金润泉、程心锦、陈子明、王邈达、罗云同去见省主席周岳，要求在存于中央银行的银元中拨给5万元。周以“中央银行所存银元是备军用的”为由，予以拒绝，要他们另行筹措。接着周又对程心锦、金润泉说，要购办军米1万石，托其办理。其间数人又要张衡协助，张不从，双方发生争吵。周岳对张衡威胁说：“你这样对待购米的事，是要被吃牢监的”！张没有理睬。三日后，程等人购米3千石去周岳处复命，张先生拒绝同去。

至于“临救会”的经费最后还是由工商界捐募解决的。因周岳不拨钱给“临救会”，大家推举张衡与高维魏负责进行劝募活动。张在电台广播中向市民发表讲话，其中讲到“临救会”、“准备过渡真空”云云。次日吕公望告诉张衡：“昨晚警备司令部赵参谋打电话到我家说，张衡在广播中无视政府，我们要逮捕他。我告诉对方，先让我调查一下再说”。

幸好两天后杭州解放，张衡才免了被捕之灾。

1949年5月3日早晨，金润泉到参议会对张衡说："市长、公安局长昨日（2日）已走，今天周嗇也要走，他走后必然要炸毁钱江大桥，希望参议会能负责处理好这件事情。"张衡听后当即到市政府了解情况，并要求按参议会的决议，转请周嗇最后走、市内别打仗、撤退后不要炸大桥，希望周嗇遵守诺言。其时市政府秘书长徐雄飞还在，徐说，周主席叫他暂时负责维持市府事务，且公安局方面他（徐）已叫监察长按参议会议案办。由于未得到确切保证，因此根据张衡的建议，参议会推出张衡、罗云、程心锦、蔡竞平、周师洛、徐福三等六人在当天下午1时在参议会集中，一齐去见周嗇，请他撤退后不要炸毁钱江大桥，保护城市建筑等。下午六人会齐正要出发时，西湖公安局长朱充到参议会说，解放军中午由灵隐后山翻过来了，他（朱）已电告周主席。张衡等六人要与朱一起去见周岩，朱说此时周嗇临行匆忙，没有时间接见你们。到下午2时后，解放大军进城，路过参议会门口，张衡带领议员二十余人，站在门口鼓掌表示欢迎。此刻正值一架国民党飞机飞临上空侦察，为保证张先生等人安全，解放军中有人摇手示意，要大家赶紧躲避。第二天在尚未解放的上海，《大公报》刊登出"张衡率同全体参议员，在会所门前排队欢迎解放军"的消息。

3日下午3时后，解放军某部政治部王主任派车接张衡去市府，商谈有关维持地方治安的问题。事后按王主任的指示，张衡会同"临救会"、商会、工会等，联合出一《安民通告》，在市区四处张贴，以安民心。5月4日，"临救会"召开全体会议，认为杭州已经解放，原"临救会"的目

的已达，一致同意即刻解散，5日登报正式声明。至此，旧杭州市参议会也已不复存在，而参议会的有关材料也全部上交军管会。

解放后，张衡先生先后任律师、杭州培新中学教师等职，也曾参加市民革和省文史馆工作。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，曾多次在电台对台湾党、政、军人员发表广播讲话，宣传大陆解放后的大好形势，自己及全家的生活情况，并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。1958年，一次黄炎培、陈叔通等民主人士来杭时，特用小车接张衡先生至“楼外楼”相聚，并共同写诗作画。这些书画以后一直挂在“楼外楼”，直到“文革”时遗失。

1953年8月，张衡先生因“历史问题”被管制。在公安局有关人员对他宣布这一决定及谈话中，还肯定他曾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。1956年7月，他又因“在管制期间确有悔改表现”而被提前撤消管制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张衡先生曾被陪斗，并被抄家，此外并未遭到更多的劫难。他曾先后接受过许多来人的“外调”，其中也不乏一些“造反派”搞“逼供信”。对此他认为：“我只能实事求是，这是做人的准则。他们（指“造反派”）要我乱写乱讲，我不干。”

张衡先生在回忆自己解放前后的这一段经历时，曾谈过自己的切身感受：“抗战胜利后，我从上海回到杭州，由于对国民党抱有幻想，错误地任职于自以为能代表“民意”、实质为国民党御用工具的市参议会议长，做了一些为国民党效劳，有罪于共产党的事。以后又逐渐认清形势，不愿再为国民党效忠，因此又得罪了国民党。如果共产党再不解放杭

州，我则必被国民党逮捕，甚至被杀。杭州解放后，原市参议会的议员许多人被逮捕法办，而对我并未逮捕，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。”

文坛高士　史界顾学

——记徐映璞先生

胡国枢　霞　影

徐映璞（1891—1981），原名礼铭，更名礼玑，字镜泉，后改字映璞，遂以字行，出生于衢州市城郊浮石潭边徐家坞村的一个耕读之家。

先生幼时聪颖好学，在随父耕作放牛之际，常以沙地柳枝习字。五岁启蒙，十一岁县试名列榜首，有“神童”之誉。十三岁入鹿鸣书院为廪膳生员。科举废止后，在衢州、湖州、杭州等地执教多年。曾从事地方自治研究，被选为浙江省宪法审查员，长期致力于地方史志的编写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应聘为浙江通志馆历史编纂，兼名胜古迹组主任，居住杭州里西湖玛瑙寺前的梅庐。解放后定居杭州鼓楼外清平山下，因此自号“清平山人”，潜心治学、著书自娱，以诗文会友。1980年秋受聘于浙江省文史研究馆。1981年辞世，终年九十岁。

先生清平一生，不嗜烟酒，布履长衫，勤俭治家，虽屡经坎坷，但终生笔耕砚田，治学不辍。精史学、博考证。凡地志方物、经文辞赋、诸子佛道，无不博治贯通，其学问之精，造诣之深，名闻东南。生前留下有关志、史、考、跋、序、传记、游记等文章四百余种，诗、词七千余首，积稿达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